

從世界近代史看反封建 主義鬥爭的長期性和艱鉅性

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出現及其覆滅，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問題：這究竟是偶然的時代謬誤，抑或是有其必然性的社會產物？為甚麼肇始於“五四”運動的中國人民民主革命在取得偉大勝利以後，竟一度出現了反人民反民主反革命勢力的大反覆？為甚麼這股反動勢力能夠肆無忌憚地大搞社會封建主義，將人民民主專政變成赤裸裸的封建法西斯專政，從而導致“四五”運動的悲壯演出？每一個關心祖國命運的人們都應認真思索這些問題。從歷史經驗中汲取教訓，最能啟發思維，使思考的人們獲得教益。有鑑於此，本文試從世界歷史的角度指出某些歷史事實，參加這一有益的探索，供大家參考。

(一)

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即便封建制度在歷史發展上已邁入完全喪失其合理性的階段，消滅封建主義，也還是一個長期、複雜而艱鉅的過程。

每當人們提及封建制度被資本主義取代的曲折道路時，通常援引世界近代史上的例子，指出資產階級革命從爆發到取得決定性勝利，在英、法等國各自花費了半個世紀或四分之三世紀。的確，發生於這時期的驚心動魄的鬥爭，反映出資產階級戰勝封建主義決不是甚麼輕而易舉、一蹴而就的事情。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開始於1640年，經過兩次內戰後，於1649年將國王查理一世送上斷頭台，並建立共和國。不久卻發生1660年斯圖亞特王朝復辟，連已故的革命領導人克倫威爾也難逃剖棺棄屍的厄運。直到1688年政變，資產階級足足用了四十八年時間才確立了自己的政權。然而，資產階級革命儘管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並不意味著反封

建鬥爭的終結。由於許多中世紀殘餘的保留，以致英國資產階級後來還需要不斷發動諸如1832年國會改革之類的民主主義鬥爭。

正當英國革命熱火朝天地進行著的時候，英吉利海峽彼岸歐洲大陸的法國封建專制制度發展到它的頂點，中央王權空前強大。為了戰勝龐大的封建國家機器，法國人民的鬥爭需要更長時間的醞釀。例如，從十八世紀初期起，哲學家們就在為改變制度、發動革命而大聲疾呼，伴之而來的是迫害、鎮壓、強迫改變信仰、強迫懺悔。歲月看來平靜地流逝，能量卻在不斷積聚，準備著一場社會的巨變。在英國革命勝利一百年後爆發的法國革命，是早期資產階級革命中能量積累最大、階級衝突最激烈的一次。革命持續不斷向前發展，一度將封建勢力打得潰不成軍。可是從1789年攻佔巴士底獄到1875年第三共和國成立的八十六年之內，法國仍須經歷1830年七月、1848年二月和1870年九月等多次資產階級革命。其間交織著革命與復辟、進步與反動、共和與帝制、內亂與外戰，國內局勢動盪不寧，鬥爭道路坎坷不平。

英、法等國的早期資產階級革命說明，歷史上從來沒有封建勢力不遭到外界的強大壓力而自動放棄既得利益、作出讓步的例子。每一次向封建主階級爭得政治自由的鬥爭，都是打退了封建勢力拚死的抵抗才獲得勝利的。一個國家為了徹底打敗反動的舊勢力，往往需要進行多次的資產階級革命或改革。不僅英、法如此，就連資本主義生產高度發達的美國亦莫能外。對美國幸運的是，它是“一個從來沒有過封建而且社會一開始就建立在資產階級基礎之上的國家”^①，加以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等等因素，所以列寧認為“無論就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資本主義發展的高度來說，無論就根據十分多樣化的自然歷史條件而使用最新科學技術的土地面積的廣大來說，或者就人民群眾的政治自由和文化水平來說，美國都是舉世無匹的”^②。不過，不要忘記，美國人民也經歷過兩次大規模的資產階級革命——1775至1783年的獨立戰爭和1861至1865年的南北戰爭，才能推翻宗主國的殖民統治，消滅落後的奴隸主既得利益集團，才使本國的經濟獲得迅速的發

展。就這個意義而言，歐美各國近代以來所取得的生產發展、民主自由，都是廣大人民群眾長期奮鬥、流血犧牲換得的果實。

從英、法兩國革命所走過的不同歷程來看，封建勢力的強大和資產階級革命的艱鉅、激烈程度往往成為正比。但封建勢力及其殘餘的掃除，卻不是光靠一次轟轟烈烈的政治革命所能解決的。1793年，法國革命面臨著巨大的困難，因而出現了革命的恐怖局面，以打破國內外反革命勢力的圍剿。在雅各賓專政時期，革命的深入發展甚至提出了廢除宗教問題。即便以今天的水平來衡量，1793年的某些措施也不能不說是頗為堅決、相當徹底的，可是那些堅決、徹底的革命手段並未能防止熱月反革命政變。因為革命的狂飆怒潮固然迅猛地襲擊了腐朽的封建大廈，盪滌著舊勢力的污泥濁水，但單憑一兩次革命高潮並不能完全解決清除坍塌建築物的殘磚碎瓦的問題，鏟除封建主義盤根錯節的地基往往要遷延時日，付出艱鉅的代價。革命的首要任務是粉碎封建勢力的猛烈抵抗，革命的完成卻需要在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各方面一點一點地廓清封建制度的基地。

因此，一個國家經過資產階級革命以後，是否順利地清除封建傳統勢力，不能僅僅根據政治革命的激烈程度來判斷，也不要被革命在形式上的似乎徹底或不徹底所迷惑。

1688年政變後，英國在政體上仍然保留了世襲君主制、議員世襲的貴族院等中世紀殘餘，但繼政治革命之後，很快就發生了產業革命這一場比較平靜但是威力並不因此減弱的變革，結果生產力迅速發展，封建制度賴以生存的分散落後的小農經濟也基本上被消滅。加上整個十九世紀之內，英國資產階級在“激進主義”的口號下不斷鞏固自己的地位，一系列民主改革陸續推進，所以英國資產階級社會雖保存著許多封建儀表，而實際上卻在比法國民主和自由的基礎上較順利地建立起來。

比起英國革命來，法國革命的規模無疑要大得多，聲勢也更加

浩大。它以“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和《人權宣言》而著稱於世，在革命時期也建立了共和國。可是由於封建勢力比較頑強，清除其殘餘就更加困難，革命之後小農經濟又長期保留，因此後來的反覆就更多一些。在回顧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歷史時，我們固然記得1814至1830年波旁王朝的復辟，但也不會忘懷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我們尤其應當牢牢記住，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不是別的階級，而恰恰是法國保守的農民舉著旗幟，奏著音樂，走向投票箱，在“打倒捐稅，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國，皇帝萬歲！”的口號下，將拿破侖三世這樣一個平庸可笑的騙子手和野心家，推上了法蘭西第二帝國的寶座。一直到十九世紀末期，軍事獨裁勢力在法國政局中仍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如果說英國是個完全資產階級化的國家，君主不過徒有其表而已；法國在十九世紀末期卻一度被稱為“沒有共和黨人的共和國”或“沒有皇帝的帝國”，原因就在於此。

(二)

今日看來，為了充分理解封建制被取代這一社會更迭的歷史過程，僅僅局限於分析近代的英、美、法等國是遠遠不夠了，必須將目光放大，通觀近現代的全部歷史，研究更多的國家。因為在以一種私有制——資本主義，代替另一種私有制——封建主義的道路上，英、美、法等國雖然幾經反覆，人民為此也付出不小的代價，但是這幾個國家卻遠非最曲折最複雜的典型。放在一部世界通史的背景中觀察，它們畢竟還是階級關係相對而言比較單純、解決封建殘餘問題比較順利的例子。

和英、美、法等國相比，在其他封建勢力更加頑固的國家，由於生產水平發展的不足，資本主義取代封建制的進程顯得格外漫長、複雜而曲折，人民為反對封建主義而付出的代價益加高昂，消滅封建殘餘的任務也特別艱鉅。

十九世紀中期，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已經普遍擺在歐洲許多國家的日程上。1848至1849年，爆發了一次全歐性的資產階級革命，席捲法、德、奧、意等等國家。由於無產階級已經成長壯大起來，當時的西方資產階級逐漸喪失早期的革命勇氣。資產階級的怯懦、動搖乃至叛賣，導致了這次革命的失敗。然而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畢竟是一個不依人們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歷史進程，人民的鬥爭終究指令“那些鎮壓1848年革命的人違反自己的意志充當了這次革命的遺囑執行人”^③。於是在十九世紀六十、七十年代，一些國家的封建階級被迫自上而下地實施改革。它們在不損害自己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根據各自國家的階級力量對比，不同程度地進行了改良、改革或維新，使封建國家逐漸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比較著名的有1861年的俄國農奴制改革，六十至七十年代德國、意大利的統一運動，以及1868年開始的日本明治維新。

如上所述，資本主義關係相對先進的國家通過一次資產階級革命，還不足以根除封建主義勢力，顯而易見，採用改良的方法即統治階級讓步的方式來實現社會制度的替代，必然更是一個遷延時日、充滿苦難的歷程。德、意、日、俄等國的情況正是如此。它們儘管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但無論政治、經濟還是意識形態方面都帶著明顯的封建胎記。

在政治上，德、意、日、俄等國的政權性質從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起，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表現為地主—資產階級的二元君主國，其中地主階級仍居主導地位。馬克思曾把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帝國形容為一個“以議會形式粉飾門面、混雜著封建殘餘、已經受到資產階級影響、按官僚制度組織起來、並以警察來保衛的、軍事專制制度的國家”^④。根據1871年4月通過的德意志帝國憲法，皇帝和他任命的宰相以及由各邦君主派出代表組成的聯邦議會，握有一切立法、行政、司法的大權，而選舉產生的帝國國會所通過的一切法律和決議都須經皇帝和聯邦議會批准方為有效。整個國家完全是一個軍事專制的

“大兵營”，幾無民主自由可言。1889年2月頒佈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則基本上以德國憲法為藍本，旨在利用立憲政治的形式保持君主統治的大權。這部憲法差不多不經修改一直保存到1945年。日本的軍事獨裁較之德國實有過之而無不及。至於沙皇專制制度統治下的俄國，直至十九世紀結束，連立憲的影子都還未曾出現。1905至1907年革命雖導致了“國家杜馬”的產生，但“杜馬”剛一露頭，總理大臣斯托雷平已把絞架賞給了革命人民。

在經濟上，上述國家農業的資本主義化走的是列寧所說的“普魯士式的道路”，即在保存大量封建殘餘的條件下，使地主經濟緩慢地轉變為資本主義經濟。它們在工業方面的發展也往往難於擺脫封建主義的影響。在評論德國統一運動的一個重要階段——1866年普奧戰爭時，恩格斯說過：“在德國的社會關係中，1866年幾乎沒有改變任何東西。幾點資產階級改革，如統一度量衡，遷徙自由，營業自由等等，——而這一切都是局限於官僚制度所能夠接受的範圍內，——甚至沒有取得其他西歐資產階級早已得到的東西，並且絲毫也沒有觸動主要的禍害——官僚主義的經營權制度。”^⑤

正因為這樣，馬克思主義奠基人經常告誡德國等國的無產階級應高度重視為肅清封建主義殘餘而鬥爭。在〈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一文中，恩格斯指出：“必須肅清大量的封建主義和專制制度殘餘，一句話，就是必須完成德國資產階級政黨由於過去是而且現在仍然是過於怯懦而不能完成的工作。”^⑥也正是因為這樣，當二十世紀初這些國家發展為帝國主義的時候，列寧稱德國是“容克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俄國和日本是“軍事封建帝國主義”，認為它們的最新資本帝國主義，被資本主義前的關係的層層密網纏繞著。

封建歷史傳統的濃厚，封建殘餘的大量保留，必然給上述國家帶來十分不良的影響。倘若對近代末期德、日等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稍加仔細的觀察，我們可發現一些共同的有趣的現象。其一是由於封

建基礎沒有受到根本的破壞，很容易依靠中央集權，用官僚行政的手段來補充金融資本的壟斷權。在德國，很早就推行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策，把軍事官僚國家機器的龐大力量和壟斷資本主義結合起來。恩格斯曾把這種國有化譏之為“俾斯麥先生的社會主義”，列寧稱德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是“軍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日本同樣依靠大力創辦和“出售”國營工商企業，來扶植私人壟斷資本主義的成長。其二是片面發展軍事工業，在對外侵略擴張政策的指導下，把軍工生產列為重點，使之得到優先的發展。其三，大力鼓吹和培養沙文主義、軍國主義意識和武士道精神。

誠然，由於某些特殊歷史條件，如對外戰爭、割地賠款、採取較新技術等等，並不排除上述某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在一定時期會有較快的進步，例如近代末期的德國。但是這種發展是靠剝奪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為代價而獲得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德國的工業產量迅速地趕上甚至超過了法、英等國，不過軍事工業佔有很大的比重，而且比起英、美、法來，德國工人的工資要低得多，工作日卻更長。同時，經濟的某些增長並沒有根本削弱封建勢力在國家政權等上層建築領域中的強大影響，沒有給人民添加多少民主和自由。到頭來，廣大人民群眾為此還得重交學費，付出更為慘重的代價。消滅封建主義的複雜性就表現在這裏。

(三)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恩格斯曾經預期：“如果一切將很順利，世界將安靜地等待著，而我們自己又能長壽的話，那末也許我們活到1900年時會親身看到，普魯士政府確實消滅了一切封建機構，而普魯士也終於達到了法國在1792年時所處的狀況。”^①然而終近代之世，無論德國、意大利或日本，並沒有出現這種“一切將很順利”的情況。相反，軍事封建專制主義的殘餘不僅沒有消滅，進入現代甚至被利用來發展成為二十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的法西斯主義。它們對內專橫暴

虐，對外窮兵黷武，終於成了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元兇，給人類文明帶來空前的浩劫，而它們民族自身也承受了可悲的惡果。

這就是說，封建殘餘的大量存在，為孳生孕育法西斯主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聯繫到近代德國、意大利和日本走向資本主義時自上而下的改良，封建傳統及殘餘的濃厚保留，法西斯主義並非憑空而降，而正是這些國家歷史發展的一定結果。當然，法西斯專政不是單純的封建專制統治，因為德、意、日諸國已經進入帝國主義階段，金融資產階級在原有的地主資產階級聯合政權中越來越起著主導的作用，而且每個國家的具體環境不盡相同，也會使各自的法西斯主義產生變異的形式。不過，如果將原來的“容克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軍事封建帝國主義”同法西斯主義認真予以比較和對照，不難看出，上述國家軍事封建的歷史傳統對於其走向法西斯道路無疑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因此，完全有理由把德、意、日等國法西斯專政稱作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軍事獨裁恐怖統治。

在納粹德國，希特勒雖然大肆標榜“國家社會主義”，其實所謂的“國家”不過是第三帝國新老大亨們的樂園罷了。希特勒利用國家壟斷和官僚經營，在經濟上使軍事獨裁政權和一小撮金融資本家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原有的大資本家紛紛充當國家經濟機構的首腦，側身於政界，而希特勒及其手下的流氓幫兇則以官僚身分躋入財閥的行列。因此，在納粹統治時代，除了傳統的富豪集團之外，又出現了一批靠佔有“國家”財產而發財致富的新闊佬，戈林就是其中的典型，戈培爾、希姆萊、里賓特洛甫之流乃至“元首”本人也不例外。他們實在是社會機體的新生贅瘤。德國歷史學家特萊希克曾指出從前的皇室“在罪孽的揮霍之中耗盡了他們祖國的脂膏”，用這句話來形容第三帝國的貴族老爺們確也維妙維肖。

眾所周知，封建主義在政治上一向以專制極權的官僚統治為其特徵。在這一方面，法西斯主義繼之而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德、意、日等國普遍建立了個人的獨裁統治。希特勒爬上“元首”的寶座

後，在十數年間成了主宰德國以至歐陸的所謂“千秋帝國”的無冕之皇。日本實行的是天皇制下的軍閥專政，如東條英機以陸軍大將的身分，同時擔任首相、陸相、內相、文部相、外相和軍需相等職務，開日本自有內閣制度以來空前未有之先例。

在法西斯桎梏下，人民群眾的全部民主自由權利均被剝奪淨盡。除法西斯黨外，共產黨以及其他一切黨派都被取締，工會和各種進步團體機構遭查封，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遷徙和罷工等自由均被剝奪，許多進步人士、無辜百姓和猶太人被投入血腥恐怖的集中營。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德國，生產力發展到很高的水平，可是納粹黨卻採用近乎農奴制的辦法來管理國家。它頒佈一系列法令，禁止農業工人流入城市，城市工人自己也不得改換工作。這樣，不僅農民像中世紀的農奴一樣被固著在土地上，工人也被死死地釘在某一企業，連資本主義社會通行的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都被剝奪了^④。

法西斯主義對思想文化的禁錮也是駭人聽聞的。在德、意、日等國，都成立了專門的教化和宣傳部門來推行所謂“元首”或“天皇”的信條，甚麼都定於一尊。希特勒反動而蹩腳的著作《我的奮鬥》被吹捧為德國文學、哲學和歷史學的典範，成了第三帝國的神聖經典，一切科學發明、文藝創作都必須從中得到啟示，其目的都是為了稱頌“元首”的功德。一種“元首”崇拜和迷信的專門儀式和制度被創造出來，人們在言談、行動之先都必須對希特勒三呼萬歲。對新聞、書刊、文學、電影、音樂、戲劇、美術等實行了極為嚴格的檢查制，凡是不歌頌“元首”和法西斯黨，凡是被認為不利其統治的作品，包括歷史名作，均在取締與焚毀之列。

由於法西斯主義的專制獨裁，富有優秀文化遺產的德、意等國卻面臨文化毀滅的厄運。在希特勒上台伊始的1933年春，納粹黨煽動成千上萬的青年學生舉著火炬在柏林街頭，焚燒了數以萬計的科學、文藝名著。歌德、海涅、左拉、杰克·倫敦、托馬斯·曼、愛因斯坦

等偉大的文學家、科學家的巨著，都成了法西斯文化專政的對象。在納粹德國行將滅亡的1944年，法西斯黨徒竟把演員和作家都送進軍火工廠去做十小時一班的苦工，或驅使他們挖掘戰壕^⑨。法西斯主義對教育的摧殘尤為嚴重，在希特勒“知識會敗壞我的青年”的思想指導下，全部學校的課本都按納粹的要求重新改編過，所有教師都奉命向學生灌輸希特勒的信條，不服從者或則解聘，或則送集中營。

顯然，法西斯主義的所作所為，在一個稍有些民主自由的國度裏，都簡直是不可思議的。然而這些卻是發生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德、意、日等國的活生生的現實。

上述這一切表明，德、意、日等國由於封建傳統勢力的頑固，由於近代消滅封建主義過程中所採用的改良道路，使它們比英、美、法等國花了更長的歲月、付出更昂貴的代價才逐漸解決了這個問題，而它們的人民也因此吃盡了苦頭，直至今日仍蒙受著或者民族分裂或者國土淪喪的惡果。但是，正是民族的厄運和血的慘痛代價，使德、意、日等國人民有了新的覺醒。以1945年戰敗投降為契機，這些國家的經濟才獲得比戰前更迅速的發展，人民群眾反對軍國主義、霸權主義，爭取自由民主和維護世界和平的鬥爭正方興未艾。人們靠將壞事變為好事而實現了歷史辯證法則所提出的必然要求。

(四)

俄國在二十世紀初走上了和德、意、日等國發展不同的道路。也就是說，俄國的革命使之在掃除封建主義殘餘的同時，不是像上述國家那樣發展資本主義，而是發展消滅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可是在這裏，我們痛心地看着由於反動舊勢力殘餘的作祟，使社會主義蛻化為社會帝國主義亦即社會法西斯主義的實例。

俄國的封建專制主義就其頑固性而言，在歐洲是無與倫比的。長期以來，專制的沙皇俄國一直是歐洲一切反動勢力的支柱。因此，

它雖然通過1861年的農奴制改革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但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卻長期沒有完成。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爆發比英國足足晚了兩個半世紀。只是由於俄國軍事封建帝國主義是當時帝國主義鏈條中最薄弱的一個環節，沙皇專制制度的反動腐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暴露無遺。加上人民群眾有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在這一系列主客觀條件的配合下，俄國才能夠在1917年二月推翻了沙皇專制政府的統治，並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取得勝利之後幾個月，即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在人類歷史上開始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

十月革命後，俄國勞苦大眾以英勇、高尚和奮不顧身的精神，滿腔熱忱地專心致力於新社會的建設。他們肩負著既要消滅封建殘餘、又要消滅資本主義的雙重任務。這些任務是史無前例的，也是十分艱鉅的。因為正如嬰兒的成長深受孕育它的母體的影響一樣，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也無法完全擺脫它賴以成長起來的那個社會基礎和歷史傳統。在沙俄時代，經濟發展遲滯落後，小生產者的自然經濟佔居重要地位，東方式的專制傳統深遠牢固，人民貧困愚昧。清理這筆歷史遺產決非輕而易舉，也不會是逕情直遂的。唯其如此，在革命之後，列寧一方面領導人民粉碎國內外敵人的進攻，一方面高度重視克服舊制度殘餘勢力對蘇維埃政權的侵蝕。

列寧十分瞭解在俄國消滅專制制度殘餘的艱鉅性和困難性，“可以趕走沙皇——趕走地主——趕走資本家。我們已經做到這一點。但是，在一個農民國家中，卻不能‘趕走’，不能‘徹底消滅’官僚主義，只能慢慢地經過頑強的努力使它減少”^⑩。他深知在存在著汪洋大海般的小生產的社會中建設社會主義，“我們苦於俄國資本主義的不夠發達”^⑪，而在上層建築領域，最嚴重的危險就是建立在小生產者社會基礎上的專制制度的官僚主義。因此列寧大聲疾呼：“現在我們的內部敵人，與其說是資本家和地主（這些少數剝削者是很容易被戰勝的，而且已經被戰勝了），不如說是投機分子和官僚主義者。”^⑫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列寧毫不含糊地尖銳地提出要防止專制制度的官僚主義對共產黨人的侵蝕，反對“現代的‘共產黨員的官僚主義’”^⑩。他說：“我們所有經濟機關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義。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說有甚麼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⑪列寧的憂慮現在不幸被證實了。

在斯大林時代，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確實取得了不少輝煌的成就，但也發生了一些人所共知的悲劇：對領袖個人迷信的流行，民主生活和國家法制的健全，肅反擴大化造成的對黨內不同意見和無辜公民的鎮壓等等。這些社會陰暗面的出現，固然有當時的國內外條件，並且不能完全歸咎於個人，但究其歷史原因，同俄國中世紀殘餘的濃厚保留、舊傳統勢力的頑固、民主自由的缺乏實有密切的淵源關係。

斯大林逝世之後，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之流雖然喋喋不休地高喊甚麼“克服個人迷信”、“健全蘇維埃民主”，實際上他們一面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成績和貢獻，一面卻大搞特搞對自己的新的個人迷信，而且愈演愈烈。最後，這一夥無產階級的叛徒竟罪惡地把蘇聯引向社會帝國主義的邪路。

目前，在蘇聯掌權的並不是從前的地主和資本家，而是打著共產黨員招牌的新官僚階級。勃列日涅夫一夥控制著經濟、政治、文化乃至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到處都可以看到沙俄時代軍事封建帝國主義在“社會主義”形式下的借屍還魂。新官僚階級利用自己竊取的大權，把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變成其發財致富的無窮源泉，肆意侵吞、揮霍人民群眾含辛茹苦創造出來並交給國家的勞動成果，權力和財富享用、支配成了同義語，其支配的多寡則和權力大小成正比；他們利用高度的集權來控制全國經濟生活，片面地發展軍工生產，鼓吹大國沙文主義，在全球各地推行霸權主義政策；所謂的“蘇維埃”成了橡皮圖章會議，大小官員實行了不成文法的終身制，許多重要部門如軍隊、外交變成新官僚貴族及其子女的世襲領地，封建式的尊卑等級森然林立；他們蹂躪法律規定的人民民主自由權利，利用“克格勃”等

秘密警察殘酷地鎮壓人民的反抗；……，等等。

綜觀近代末期和法西斯統治下的德、日等國以及今天的蘇聯，其經濟的發展至少以下的共同特點：利用中央集權、官僚經營、國家壟斷，強制推行工業化；畸形、優先地發展軍事工業；經濟片面地迅速發展，而人民生活水平並未得到相應的提高；生產有所發展，可人民的民主權利沒有添加多少。

在近代德國，階級力量的對比，人民革命壓力的相對強大，曾迫使反動的封建主成為“革命的遺囑執行人”，而在現代蘇聯，舊制度殘餘的根深蒂固，卻使原來的“共產黨人”變成法西斯勢力的新代表。這種深刻的歷史教訓，值得一切革命人民引為誠鑑。

十月革命迄今已有六十餘年，蘇聯從社會主義淪為社會帝國主義的慘痛教訓，使人們開始認真考慮這樣一個帶根本性的重大課題：在一個封建歷史傳統濃厚、中世紀殘餘深固的國度裏，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怎樣防止舊制度殘餘在“社會主義”形式下的捲土重來？這使我們不禁想起列寧在六十多年前說過的話：“由於歷史進程的曲折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國家愈落後，它由舊的資本主義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關係就愈困難。”¹⁶

*

*

*

三十年來，中國人民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歷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遭受過種種挫折和失敗，甚至出現林彪、“四人幫”封建主義復辟這種歷史的倒退。粉碎“四人幫”以來，廣大人民群眾已越來越認清了把反對封建主義餘毒的鬥爭徹底地進行下去，在四個現代化中發展社會大生產並同時發揚人民民主的重要性，也逐步加深了對消滅舊制度殘餘勢力的長期性和艱鉅性的認識。在這個意義上認真研究世界歷史的經驗教訓，於對認識和解決我國新階段面臨的新問題是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的。

註釋：

- ①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英文版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98頁。
- ② 〈關於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新材料〉，《列寧全集》第22卷第1頁。
- ③ 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48頁。
- ④ 〈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21-22頁。
- ⑤ 《德國農民戰爭》第二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90頁。
- 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80頁。
- ⑦ 《德國農民戰爭》第二版序言的補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98頁。
- ⑧ 參見阿·諾爾登：《德國歷史的教訓》，三聯書店1958年版125-127頁；威·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三聯書店1974年版第373-376頁。
- ⑨ 參見格·艾斯勒等：《德國的教訓》，三聯書店1959年版第165頁。
- ⑩ 〈給馬·索柯洛夫〉（1921年5月16日），《列寧全集》第35卷第490頁。
- ⑪ 〈關於黨綱的報告〉，《列寧選集》第3卷第788頁。
- ⑫ 〈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聯席會議上的演說〉，《列寧全集》第28卷第373頁。
- ⑬ 〈給莫洛托夫並轉政治局各委員〉（1922年3月16日），《列寧全集》第33卷第210頁。
- ⑭ 〈給財政人民委員部〉（1922年2月22日和28日），《列寧選集》第35卷第552頁。
- ⑮ 〈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報告〉，《列寧選集》第3卷第454頁。

（與張廣達先生合作，以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後聯名發表於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探討》創刊號，1980年10月出版。）